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全球「自」理：在思想史脈絡中實踐負責任的大國角色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Self Governance: Placing the Responsible
Major Stat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doi:10.30390/ISC.201206_51(2).0001

問題與研究, 51(2), 2012

Issues & Studies, 51(2), 2012

作者/Author：石之瑜(Chih-Yu Shih);邵軒磊(Hsuan-Lei Shao)

頁數/Page：1-3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206_51\(2\).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206_51(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全球「自」理： 在思想史脈絡中實踐負責任的大國角色*

石之瑜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邵軒磊

(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當代中國政治領導人及公共知識分子努力營造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雖然他們審慎地觀察外界如何期待中國，但是他們卻又未必願意滿足外界對於所謂「負責任」的定義。在全球化時代，外界總是關心中國是否能夠參與解決、減緩或預防各種全球治理問題。不過，不論是古典的或當代的中國政治思想，往往強調反躬自省，因此中國政府在體現對自身的世界責任時，幾乎無例外的都以中國能妥善處理與全球治理相關的內部問題為目標，以確保中國自己不成為全球問題為職志。相較於歐美發達國家勇於標舉全球治理的實質責任，北京領導人更關心如何分攤全球治理的責任，尤其在意全球治理不能侵犯各國的國家主權。這種防禦心態有其歷史背景，但是必須回溯中國的當代思想史脈絡，才能夠充分掌握中國政府對全球治理的消極情感及其相應主張。更符合中國思想史的全球治理，應該是全球「自」理。這樣思維一旦養成，就超越了單純是為了擺脫強權干涉中國的動機，而進一步對當代全球治理的方法論形成挑戰。

關鍵詞：中國崛起、全球治理、政治思想、知識史、國際經濟典範

* * *

壹、序言

不論是什麼派別的国际關係理論，應該都能接受：在邏輯上，中國崛起導致北京

* 本研究為國科會研究計畫「中國學的知識人類學研究」（計畫編號：NSC-98-2811-H-002-015）暨國科會研究計畫「中國研究方法的再思考：以東洋文庫學術系譜為例」（計畫編號：99-2410-H-002-248-MY2）之研究成果。

增加全球事務中的責任分擔，也預期北京有更多機會成為國際事務之領導角色，因而更深更廣地捲入或介入全球事務。^①果然，「美國 2010 國家安全調查」就具體提出希望中國擔任「負責任之領導角色」。^②對此，本文想論證的是，根據中國文化或意識形態的既有脈絡，在思想層次上，中國政府並無意願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原因在於，中國政治思想中鼓勵反求諸己，故對中國領導人而言，更重要的任務是，妥善處理好全球化及其所帶來的各種內部治理問題。雖然「責任」一詞，已經屢次在北京各種層級的發言中反覆出現，宣告中國將成為「負責任的大國」；^③但「責任」一詞所引發外界的期盼，就不只是做到中國應該負起對內治理任務而已，而更在於某種對外領導或參與解決其境外之全球問題。除非，解讀者能同情北京所暗示：「只要妥善的對內自我治理，就是中國對全球治理上的貢獻。」否則，便難以理解身為未來第五代領導習近平，為何在 2009 年 2 月 11 日訪問墨西哥之際，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的身分，直率反駁國際對中國的批評：「…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貧窮和飢餓，三不去折騰你們，有什麼好說的…？」^④這項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反駁，可認為對此一論點做出了提綱挈領的概括。

更進一步，北京還似乎相信這種自我治理的要求，足資成為其他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可行仿效的典範。北京不只認為主要大國應首先根據其自己內政上應負的責任，擔起、減輕全球治理問題，國際組織也應當優先看待大國的責任，而小國同樣應該被允許及鼓勵在其內部自行處理涉及全球治理的事。如果所有國家都把內部涉及全球治理的問題妥善處理，全球治理也就自然實現，不須透過外來干預。一旦各國均如此，就能盡量減少，以全球治理為由進行干預；而且這樣的干預，理當應先得到干預的對象國家所同意才進行。不過實際的情況是，區域和全球範圍中都早已存在各種各樣的全球問題有待處理，這當然要靠包括了國家與內外非政府組織在內的行為者相互合作。不過，對於北京而言，非政府組織之所以有用，是因為他們有時可以協助北京，分擔

註① Lai-Ha Chan, Pak K. Lee, and Gerald Chan,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A China Model in the Making?"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14, No. 1 (Mar. 2008), pp. 3~19; Jing Gu, John Humphrey, and Dirk Messner, "Glob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 2 (Jun. 2008), pp. 274~292; John Humphrey and Dirk Messner, "China and India as Emerging Global Governance Actors," in Raphael Kaplinsky (ed.), *Asian Driver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DS Bulletin*, Vol. 37, No. 1 (Jan. 2006), pp. 107~114; Thijs Van De Graaf, "China as a Driving Actor in Global Governance? Feasibility and Future Challenges," *Studia Diplomatica*, Vol. LIX, No. 2 (Jun. 2006), pp. 168~169;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 22; Shen Wei, "In the Mood of Multilateralism? China's Evolving Global View," Working Paper, *The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July 2008);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註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see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p. 43, accessed on June 4, 2010.

註③ 在 1997 年 4 月 24 日，江澤民率先在對俄國國會的一次演講中，公開使用負責任一詞描述中國的自我期許。見人民日報〈北京〉，1997 年 4 月 24 日，版 4。

註④ 編輯部，「習近平譴責他國對華事務指手畫腳」，文匯報〈北京〉，2009 年 2 月 13 日，版 4。

任務、提供情報與技術、為特定國家提供資源。

本文把北京因應全球治理的立場，尤其是對於國際干預的消極態度，回溯到中國的經典與當代思想史脈絡。使用的資料，有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無為而治」的推崇，也包括了社會主義關於集體主義的價值主張，以及由制度與歷史形成的思維習慣，如：由上而下的政治協商與民主集中、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落後所導致的自信不足、美國自二戰以來支配包含聯合國在內各國際組織所引發與北京的鬥爭經驗。上述這些思想之間的共同特點，就是北京當局警惕自己不可變成霸權；在論述中尤其關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和諧關係，但與特定議題上建立某套國際規範或價值無甚關聯。^⑤所有的這些思想傾向共同指向一個假設，即全球治理下的國家行為者都應該是自給自足的，他們以平等的地位參加全球治理；因此在認識論上，北京假定各國都有能力反躬自省地掌握問題，邁向更完善的自我治理，亦即全球治理絕非靠少數掌握真理的先進國家透過干預所能獲致。這樣所形成的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實踐，在國際間是被動因應狀況而非主動採取預防，是問題導向而非價值導向；更注意主要強權國家的責任和改革，而不是關注在失敗國家的改造。^⑥

貳、文化和政治脈絡

一、傳統與現代兼具

北京當局在改革開放前的外交政策，大都是以「革命」為基礎思維，幾乎不可能對儒家或道家有正面評價。文革中的暴力行為更給吾人這種強烈的印象，特別是針對儒家的迫害。然而，較為敏感的研究者仍然可以發現，直到今日，身為中央之國或中原的心情，依然保留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諸多現象中。^⑦事實上，從當代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激烈辯論中可以看到，原本針鋒相對的社會主義與儒家思想，兩者逐漸在對於傳統意識的看法上有所合流。新左派思想家從原來肯定毛澤東思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貢獻，到如今越來越多地轉向從傳統文化和哲學來解釋中國過去的成功，

註⑤ 在開展推論之前，本文必須強調，討論責任或治理觀念時，也不能忽略中外在文化基礎上的差異性。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由於宗教（意識形態）的基本不同，造成了種種在地觀念的不同，最早體現在韋伯的對中國宗教的理解，請參考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儒教與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2007年）。

註⑥ 後續研究者也多強調中國有其發展特性，稱為「基體」，Yuzo Mizoguchi, "A Search for the Perspective on the Studies of East Asia: Centering on Chinese Studie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 1 (2001), pp. 7-15. 另一個途徑，是由民族形成時的各種自然狀態，來推論民族文化特性的，有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年）。

註⑦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Daniel Bel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Hundred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Krishna Praksha Gupta, "China'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vention," *China Report*, Vol. 7, No. 12 (December 1971), pp. 12-21.

並援引之以為今後的方向。相反的，借用西方多元價值進行論戰的自由派，反而質疑歷史遺產阻礙中國現代化。研究五四運動的專家林毓生過去早就指出，在反傳統的五四知識分子言行中，透露出他們與所反對的前輩共用的文化價值。^⑧對外界來說，左右之爭並不十分要緊，因為在雙方的爭執中，即使屬於各自不同的語意脈絡，傳統思想和社會主義的敘事總是相互滲透。這樣的觀察在當代社會科學的文獻中並不陌生，比如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提出了「共產仕紳」的概念，^⑨白魯恂 (Lucien Pye) 用的是「幹部京官」的稱謂，^⑩沃爾德 (Andrew Walder) 則有「新傳統主義」的提法，^⑪或石之瑜所謂的「集體主義民主」。^⑫他們給讀者共同的印象是，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以取代中國既有行為模式的方式在開展，雖然整體的行為與價值體系確實產生變化。

在宏觀面上，印度研究者古普塔 (K. P. Gupta) 立場明確地堅持指出，中國現代性並非傳統的代替品。他發現儒家或道家都在規範現代性，在中國文化下獲得實踐的現代性，亦即經過數代的建構，靠著某一種不絕如縷的文明脈絡，把看似矛盾的價值觀，勾織成爲一個有意義的整體。^⑬戰後的日本思想家溝口雄三特別熱衷於回溯「基體」，反對「革命史觀」這種從根本上擺脫過去的思維。^⑭同理有澳洲學者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在研究時發現，對現代性的追求並不是爲了取代過去，而是在某種不受質疑的民族母體想像中開展。^⑮此外，東南亞學者王賡武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後看到了歷史與文化週期的出現。^⑯已故香港記者張國興闡述了毛澤東思想中的傳統思想，^⑰而大陸學者汪澍白說明這樣的傳統思想影響，早在毛澤東年輕時就已經根深蒂

註⑧ Lin Yu-Sheng, "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in Benjamin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註⑨ 對共產仕紳的描述，可見 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註⑩ Lucien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nn Arbor: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註⑪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註⑫ Chih-yu Shih, *Collective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of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⑬ Krishna Praksha Gupta, "Tradition of Moder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n and Western Systems," *China Report*, Vol. 9, No. 29 (1973), pp. 29-45.

註⑭ Yuzo Mizoguchi, "A Search for the Perspective on the Studies of East Asia: Centering on Chinese Studie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 1 (2001), pp. 7-15. 另參見邵軒磊，「文革後日本中國研究之轉型」，*問題與研究*〈臺北〉，第46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55-172。

註⑮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⑯ Gengwu Wang,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No. 2 (September 2004), pp. 311-322.

註⑰ Kuo-sin Chang, *Mao Tse-tung and His China*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1978).

固。¹⁸最後，臺籍美國道學家吳光明¹⁹和臺灣學者石之瑜²⁰也同時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式論述中帶有傳統中國意涵，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眾人仍試圖證明自己無私無我，正是代表儒家思想意識的潛流。²¹

傳統思想和社會主義能不顧其邏輯上的衝突，而在當代政治話語的實踐中合致，至今並無太多研究對此討論。關鍵在於，變遷的思想史脈絡中，其間有社會主義和儒家思想之間共用的群己概念。首先，儒家哲學強調無私無為，雖然社會主義積極動員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前提是個體的動能必須要對集體有所貢獻。集體中的成員各自履行其角色責任，而領導者則確保所有成員在物質上得到保障。只有假定統治菁英能支配所有的資源，其「無私」才是有意義的、可能的且可行的。這也就表示人民必須同意把資源配置的權力交給領導人，可見他們已經相信領導人具有無私的精神。在現實中，統治者應盡可能的在遂行徵收之際從事聚養生息，進而能在緩解民困時出手大方，令天下折服。儒家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出相反的方式來實現這種無私的理想。在儒家思想中，最高境界是無為而治；而在社會主義下，則是群眾路線和政治協商制度。

二、和諧與內斂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過程受到文化與思想上的制約。儒家勸導君王必須經常反省和內斂才能達到昇平和諧的統治，²²這反映天下為公的理想，其間君王表現「無私」的仁德，並且調和鼎鼐，治理天下。換言之，由於小人（低階層）難養，君王應該避免捲入民間俗務，否則將不當影射君子意圖強加其自身的設想於小民，導致私心自用的印象。在實踐上，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的統治者對於象徵和諧的儀式堅決不可省，其公而忘私具體表現在減稅減租、休養生息的預算政策。另一方面，道家雖然反對任何儒家儀式，但是也絕不贊成干預社會運行。根據儒家和道家，理想化的領導哲學應該是「無為」。君王應該賦予小民保有充分的生產資源，尤其是在欠收的年代，以容倉稟足而復知榮辱。這可與亞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理念比擬，雖然後者強調的是效率，而非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和諧。同時，儒家經典反覆叮嚀的是，保持小民對君子的景仰之心應比掌握物質權力重要，所以統治的首要著是供足百姓之食。一言以蔽之，君子應該與民分享天下的資源，特別是農欠的時候，至此已經是儒家有所為的公共管理極限。而這裡所表現出來的真正關懷，不在於管理，而是強調君民之間如何維持和諧關係。

註¹⁸ 汪澍白，*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基因*（香港：商務，1990年）。

註¹⁹ Kuang-ming Wu, *On the Logic of Togetherness* (Leiden: Brill, 1998).

註²⁰ Chih-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90).

註²¹ 胡平，「比賽革命的革命：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分析」，胡平文選，見 http://www.boxun.com/hero/huping/43_1.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10 月 7 日）；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²² Thomas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根據儒家思想，君臣失義的關係遠比權責不符的體制更嚴重。如果對某個全球問題的責任感，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前提，儒家思想絕非解答所在。儒家的責任理念是對自己內省；如何免於過度凸顯個人是維繫社會安定的關鍵。這套思想用在政治統治上時，內省的君子不會暴斂橫征，故小民遇有失調便應對自己的處境負責，不至於向君王討回賦稅。即使在毛澤東的時代，共產黨基本上仍沿用儒家思想的相同邏輯，比如主張革命不能輸出，堅持革命應該是當地人民的責任。²³如今這種自製風格正發展出中國對全球治理的思慮。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時代前，中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也反映出儒家思想的痕跡，以施捨展現仁德為考量。即使數額每每有限，北京一貫強調中國對外借款與歐美迥然不同，因其低利率或零利率，而且沒有附加任何政治條件。²⁴這說明北京堅持對外援助的做法應該體現無私，這比對外援助的實質，更為重要，因為唯有無私奉獻，方能行走蠻陌之邦，廣結善緣。

三、群眾路線和政治協商

在 1949 年之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其實踐仍然在深層延續儒家的群己思想。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平均主義」思想，這也同時是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邏輯。平均主義是保證沒有人會被遺漏，人人都參與分配。「群眾人人參與」正是民主集中制的理想境界。群眾路線鼓勵最大範圍的參與，固然如此動員與儒家思想的無為而治有所不符，但因為群眾參與是實踐平均主義所不可或缺，群眾的能動性一旦啟動，共產黨無須介入，因此到頭來，仍鞏固了儒家以統治者之無私為核心的政治價值，這導致共產黨的領導過於理想而難以實踐。²⁵其結果，所有共產黨的理論建立與政治操作，都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群眾路線的浪漫形象。共產黨統治正當性的深層基礎反映了儒家思想，所強調的正是，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者自然沒有資產階級才有的局部利益考量，則必然代表集體利益。²⁶群眾路線顯示共產黨承繼儒家的天下為公思想；統治者唯有是群眾集體的領導時，其統治才合法。

中國在 1949 之後的內政外交皆強化了集體主義價值作為統治正當性的基礎，使永久執政的共產黨感到必須設法取得群眾明示的認可，為達此目的，「政治協商」從此成為社會主義的制度特點，大量政策要經由冗長繁複的說服，幾上幾下的往返徵詢，不厭其煩地動員主要受到影響的民眾明示自己接受政策。²⁷協商往往不只是形式的，只

註 23 編者，周恩來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393；Also see Peter Van Ness, "Mao Tse-tung and Revolutionary Self-Relianc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0 (January/April 1971), pp. 68-74.

註 24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9).

註 25 Taru Salmenkari, "Searching for a Chinese Civil Society Model," *China Information*, Vol. 22, No. 3 (November 2008), pp. 397-421.

註 26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上海：新中國書局，1990 年）；中共中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註 27 Wei Pan, "Toward a Consultative Rule of Law Regime in China," in S. Zhao (ed.), *Deba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Rule of Law vs.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6), pp. 3-40; Paolo Urio, *Reconciling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0).

是個別民眾面臨極大的社會壓力而不得不最後表達合群與犧牲小我的美德。但是，不能排除一旦遭遇拒絕合作的釘子戶，又適逢媒體的關注，這種協商所奠基的天下為公思想，也可能帶來治理者的挫折。在全球化時代，政策合法性隨時可能因為釘子戶透過媒體而更為戲劇化，任由民眾自給自足的傳統思想在統治者強力整編土地之際，反而被人民當成弱者的武器，對抗政府，凸顯出正當性不足的尷尬。於是，幸運的反抗者成為不屈服的英雄，戳破政府的偽民主；也有倒楣的草民則遭到基層領導的霸凌，其情狀依然有如封建時期。

四、圍城心理與自卑

在韓戰期間，聯合國對於中國的譴責案，給中國爾後帶來凡事都直覺地反對國際干預的敏感心理。任何強權國家或者國際組織的單方干預行動，都會提醒中國回想之前聯合國制裁的陰影。通常針對一個羸弱或所謂失敗國家的干預，只要沒有得到對象國家同意，即使有國際組織的名義，也會立刻引起北京懷疑有強權政治在作祟。^⑧而且因為全球治理通常導致某種程度的干預，因此北京總是堅持應先使用說服，代替直接干預，從而歐美國家認為北京妨礙全球治理的達成。但從北京官方觀點來看，除非在事前獲得當地人民同意，不論是全球治理、人道主義或者任何其他藉口，總是有對帝國主義引狼入室之虞。

思想之外，心理問題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另一障礙。儘管現今流行「中國崛起」的說法，但是北京依然間歇地受制於自卑情結，寧願相信中國仍然是一個有待改革的後進國家，沒有作好準備對疆域以外的事務負責。與自卑感有關的，是北京在華府對華政策中解讀出遏制中國崛起的意圖，處於一種持續被圍堵焦慮心理狀態。^⑨偶爾，北京會釋出中國其實並未崛起的埋怨，或澄清所謂華府和北京組成的 G-2 領導是空穴來風，^⑩強調北京對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不感興趣。北京所謂的「全球」，仍與「國際」或是「國外」的概念之間如何區隔，模糊不清。也就是說，北京對於安全與主權象徵有關的事務極度敏感，繼續阻撓北京參與跨國界的全球事務。為了維護主權獨立，北京寧可忽視全球化時代中，國內與國外所發生的事之間難以切割，^⑪不僅所謂發生在國外的事情必然會影響中國，所謂中國境內的問題也同時影響外國。北京各界不時引用鄧小平的箴言「韜光養晦、絕不當頭」，刻意不對全球事務提出治理原則或價

註⑧ Keping Yu, *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Essays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hin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 149.

註⑨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Pess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註⑩ G-2 被指為對中國的捧殺，見黨建軍，「中美氣候問題爭辯與話語權爭奪」，http://www.qstheory.cn/tbzt/gbhg/zxbd/200912/t20091214_17018.htm (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2 日)；also see Jian Junbo, "China Says 'No' to G-2," *Asia Times* (May 29, 2009),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KE29Ad01.html>, accessed on June 2, 2010.

註⑪ 亦即，和平共處是比治理更高的價值。李義虎，*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新思維*（香港：China Review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年），第一章。關於後來者的心態，見蔡拓，「全球治理的要義及其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南京），第 4 期（2005 年 4 月），頁 29~35。

值標準，遑論與歐美國家一道討論如何干預別國違反所謂普世價值的現象。北京領導想要集中於中國內部事務的管理，致力於讓全球治理不會干預到中國。中國小心面對自己既要贏取歐美國家的認可，又要擺脫各種全球治理過程中對普世價值是否支持的表態，應付在各種各樣全球問題上拒絕參與所導致的批評。要維持一致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堅守各國自治、反對干預和當事國同意的三位一體政策。

參、逐步形成的政策原則

一、和諧世界

中國全球治理之邏輯，可從其內部統治之邏輯衍生而來。北京已經意識到嚴重的內政治理問題，尤其是由於近二十年的急速發展，帶來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分化。其他危機包括環境破壞、社會福利及醫療服務之不足、犯罪增加、以及人口問題例如高齡化、下崗問題、民族紛爭和農民工等。這些危機原本需要積極的因應策略，然而政府卻採用了「和諧世界」此一看似突兀的消極理念作為整體指導原則，它代表對先富者期待能自我節制，為弱勢者設想與注重社會整體。^②和諧世界的理念不直接處理危機，相反地是在培養人們的態度，特別是幹部和官員，使他們具備因應這些危機的心理素質。因此每個能替自己創效益的人都必須認知到，自己在物質上及社會關係上對別人造成的影響。先富者人人如此自省與調整的話，就可以防患問題於未然。即使在具體的問題上，黨往往需要協助實際狀況裡的人解決立即的現實問題，然而，黨必然希望人民能有意識地透過自我覺醒來減緩改革發展所帶來各種治理危機。如此主張藉由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內省式管理，似乎正是北京參與全球治理之際的期盼。

「中國崛起」一詞在讓中國感到欣慰的同時，也帶來不安。^③這種不安來自霸權國家美國必然對挑戰者中國採取遏制，裹脅區域強權如日本、印度與臺灣採取牽制。另一方面仍可以感到欣慰的，則是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第一次獲得全球主要國家的認可。在 1997 年鄧小平去世之後，江澤民為首接班的第三代領導，在心態上已經完全沒有人再可以庇蔭。不過一直等到香港回歸還中國，標誌性地代表殖民主義的恥辱已被清洗；其後立即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擊退來勢洶洶的國際投機客，無異宣告中國世紀終將來臨。也是同一年，大國外交成為眾所矚目的議題，「第三次思想解放」促成市場經濟與財產權改革入憲。伴隨的因素，是中國決定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註② Hongying Wang and James N. Rosenau,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Asian Perspective*, Vol. 33, No. 3 (Fall 2009), pp. 17-22.

註③ Yong Deng, "Better Than Power: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p. 60-62; Daniel Lynch, "Chinese Thinking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m as the *Ti*, Rationalism as the *Yo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7 (2009), pp. 87-107.

又經過六年，中國領導重新以「和平崛起」定調中國的新形象。^④這個宣示重心原本在於中國崛起的方式為和平的，主要是要回應外界對中國威脅的恐懼。但這個概念旋即為官方捨棄。的確，「崛起」的提法在中國自己的天下為公思想脈絡中就格格不入，不論這樣的脈絡是表現成無為而治、群眾路線或永遠屬於第三世界。任何有關「崛起」的提法，都會破壞中國「無為」、「德治」的形象。何況，在國家定位上，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的自我期許言猶在耳，這時，2005年以後訴諸「和諧世界」，顯然是更為貼切的自我認識。^⑤

和諧世界的意義用在對外與對內的情境中有些不同。在對內的和諧世界中，人民理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家一起學習自己在比如環境保育或社會和諧各方面所應履行的角色。但是在對外的和諧世界中，中國充其量是扮演一個配合的角色，並不積極參與訂定各個全球議程上實質的規範。對內，中國共產黨是治理知識與經驗的來源，但在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則自覺無此經驗或知識為後盾。試想，如果共產黨試圖說服某個目標地區或者團體接受干預，中國自己不也就大可以成為全球治理過程中的另一個目標？既然國際典範不是中國關心的議題，中國也沒有能力影響全球議程，其結果，中國確實經常只是在國際規範形成過程中的後來者，一旦參與其中，意味的就是要調整自己，北京領導人鮮少針對全球治理所仰賴的標準，與歐美進行思辨，而更關心在已經提出的標準上，中國或各國是否因地制宜且公平地分攤治理的責任。例外地，也許是提出發展權對抗人權，但即使如此，也是在說服外界用發展權為標準檢查中國，而不是用來到各地去檢查別國的標準。實際上，自己提不出全球治理標準的中國，常被當成是全球問題所在，包括環境破壞、人權問題、流行病、核擴散等等。中國在全球治理的話語下中忙於因應，並無意願擺出治理者的姿態。在這樣被動的情形下，又要能與和諧世界理想配合，又能夠為中國設想一個全球治理中的適當角色，北京領導人最後接受的自我定位，就是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這個自我定位的提出先於和諧世界，但如今是和諧世界概念的重要補充，也透露出中國理解全球治理的多種含意。

二、（對自己）負責任的大國

首先，根據北京領導人對主權與自給自足的堅持，以及儒家思想與社會主義不存在對選民負責的制度，則所謂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就只能是負好自我治理的責任。第二，既然負好自我治理責任是好事，所有大國都應該先管好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而不是忙於干預別國怎麼治理。第三，因為不可能有任何國家有資格自稱睿智無私，則

註④ Bijian Zheng,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註⑤ 吳梅興，「和諧世界：全球治理的中國詮釋」，*濟南學報*（濟南），第4期（2007年8月），頁43-45；崔艷紅，「討論中國的和諧世界思想對全球治理的意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廣州），第3期（2006年5月），頁65-69；楊柳，「論和諧世界思想和全球治理」，*中國水運*（北京），第1期（2007年1月），頁155-157。

各國所應負的自我治理責任範圍，必須通過所有當事國家都參與的多邊談判來劃分。最後，對於沒有能好好統治的國家，應該鼓勵他們透過努力學習趕上治理良好的國家，外界不應該直接干預。唯有透過多邊民主的協商過程，由每個國家自己同意其在內政上分擔全球治理職責，如此自我治理便是全球治理核心。³⁶對於中國來說，全球治理應該是各國透過多邊協商，依照國家能力，決定問題所在與治理手段，進而各自分擔責任的過程。如果所有國家都能對其國內有關的全球治理問題負責，他們之間就沒有為了治理相互干預或衝突的必要，如此，和諧世界的維護，將會是和平獲致全球治理的最好途徑。

現實上來說，宣傳和諧世界間接透露了北京在心理與思想上的依據所在，足以讓外界驚覺的是，原來中國共產黨無法確知世界治理應有的目標為何，甚或無意提供有關全球問題的實質性政綱。和諧世界的提倡，既是遮蔽也是合理化多數情況下中國的被動態度。³⁷另一方面，對全球干預所抱持的消極被動態度，通常伴隨著積極對外解釋中國已如何有效處理在主權管轄範圍內的全球問題。這也導致外界的懷疑，進而批評中國以尊重他國主權為藉口，逃避自己通過積極干預來緩解別國內部的全球治理問題。北京有時在與其他國家協商時，表現出相當積極的態度，提供其他國家從中國內政管理經驗中找尋治理之道。這種無強制性的諮商協助，是中國在面對全球治理中不合作的國家時的因應之道，故而不必採取直接干預。最起碼，這樣的立場為中國自己提供了雙重思想防護，免於其他大國不懷好意地找藉口干預中國，亦即從原則上講，干預自始是不必要的，此其一；能夠自我負責的中國更是絕無理由成為干預對象，此其二。

和諧世界也與群眾路線若合符節，畢竟中國的立場永遠是通過說服而不是制裁性的干預。若要中國政府同意干預，需要滿足三個必要條件。第一，所有相關的國家應該一致同意干預，而不是交由某些主要國家來代為決定。其次，各國必須經由多邊協商達成在干預條件、目標、方法上共同決議。最後，干預的目標國也應該事先同意。無論是否是有意識的挪植，共產黨把中國內部政治協商的過程，作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參考依據。群眾路線要求的同樣是多邊協商，應該強調說服的過程，而不是採取限制或威脅要採取制裁。北京領導人似乎假設，被干預的國家應該也會希望像中國一樣與世界其他國家維持或恢復和諧關係。中國式的說服內容，通常專注於怎樣使潛在

註³⁶ 張勁松，「論全球治理時代我國政府的責任」，*社會科學戰線*（北京），第8期（2008年8月），頁158-164；龐中英，「中國到底怎麼參加全球治理」，*國際先驅導報*（北京），2009年7月13日，參考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2523>（參閱時間2010年6月1日）；Zhe Song, Keynote Speech given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 the EU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Brussels, May 6, 2010), *Newsletter of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uropean Union* 40 (May 14, 2010).

註³⁷ Yeling Tan,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A Perspective through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006*, Center on Asia and Globaliz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une 2009); Zhongying Pang, "Playing by the Rules? China's Growing Global Rol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October 18, 2008).

的干預目標國家扮演被期望的角色，而中國就是這種依照角色演出的最佳示範。

三、述而不作

大陸知識界關於全球治理的種種論述正逐步浮現，但學術性和官方論述仍然有限。主要的關切在於如何以「和諧世界」的目標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但文獻中通常缺乏具體的正義世界觀，遑論治理全球議題的理念。中文文獻並無興趣在具體全球問題上設定任何實際可行的政綱。這些論述所專注的反而是中國面對全球治理的呼籲應該如何妥適的回應。儘管在文獻中出現各種各樣對全球化的立場，有的支持、有的懷疑，也有的質問中國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參加治理全球議題的行列，但是他們幾乎無不同意中國需要好好重新調整其國內作法，才有可能真正做個負責任的大國。³⁸罕有觸及中國如何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領導角色的討論，亦少有對全球治理規則與程式所仰賴的價值加以著墨者。內省式的反應是知識界在關於全球治理文獻中表現的主要風格。

文獻透露出對全球治理的意義或含意感到猶豫而不確定。多數的文獻仍同意，全球治理是不可迴避的挑戰。這些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忠實地轉述歐美所提倡的全球治理為何。³⁹至於中國應如何安排自己在全球治理過程中的位置，文獻中可以整理出三個疑難雜症。首先，這些文獻中注意到美國權力下降是全球治理躍上議程的主要背景，但是文獻中並不確定是否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國家已經準備好要代替美國領導。其次，文獻一方面提出「國家安全」所涉及的範圍應該比政治或軍事安全的範圍更廣泛，但另一方面，普遍的認知又是，任何非傳統的安全議題都可能成為干預中國內政的政治操作，成為侵犯中國主權的工具。最後，文獻對於全球治理是否應該體現自由主義價值存在不同看法。

多數意見認為全球治理時代提供中國許多機會，但所謂機會並不是指中國可以藉此擴大影響力，而是指會讓國際政治變得更民主。文獻經常好以 G-20 的形成和與金磚四國（BRIC,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參與全球的經濟事務決策過程，來證成華府在全球經濟議題上已難呼風喚雨。⁴⁰多邊主義常在文獻中被強調，認為這是在沒有超強主導的世界中進行全球決策的唯一正當手段。照理，多邊主義是比較民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包括所有國家的多邊參與可以讓全球問題的解決更公正，意味著責

註³⁸ Wang and Rosenau, *op. cit.*

註³⁹ 例如可參考楊卓，「全球治理初探」，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呼和浩特），第 36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39~42；白云真，「全球治理問題的回顧與前瞻」，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4 期（2007 年 4 月），頁 76~83；包雅鈞，「中國學術界有關治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甘肅理論學刊（蘭州），第 4 期（2008 年 7 月），頁 45~49；謝雪華，「關於全球治理的幾個問題」，湖湘論壇（長沙），第 22 卷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120~122、128。

註⁴⁰ 如 2010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報引述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沈驥如 <http://news.sohu.com/20100326/n271128716.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5 月 31 日）；葉青，「參與全球治理恰逢其時」，2010 年 4 月 13 日，http://www.dzwww.com/rollnews/news/201004/t20100413_5984558.htm（參閱時間 2010 年 5 月 31 日）。

任可以按比例分配，由那些具有解決全球問題能力的發達國家，擔負更多責任。如此，全球問題是國際共同的問題，而不是總由少數所謂失敗國家扮演代罪羔羊，等待指責與干預。^①換言之，在這種思路下，沒有哪個國家必須承擔超級強權的義務，華府也不應該試圖恢復美國這種地位。一旦識及於此，全球治理便可成其為民主治理，讓全球責任由各國分擔，且各國對所負責任都應該經過談判協商確認並同意。在這過程中，中國主要的任務就是確保責任分擔是公平的。

學術與官方文獻間的共識，是都將當代國際政治的特色描述為「一超多強」（一個超級大國和多個大國）或者「多極化」。^②準此，對由華府和北京組成所謂的 G-2 共治幾乎沒有正面回響。論者所懷疑的是，即使 BRIC 四國加起來，也無法取代超級大國。一位曾為政治局常委講課的知名學者指出，這四個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國有能力自己單獨領導，而他們之間在處理任何事情時，幾乎都不能取得共識。^③如果他們真的試圖建立領導權，全球治理將立即淪為他們之間競爭的舞臺。儘管對於美國霸權的衰退程度存在不同判斷，文獻所透露的訊息是，中國並不會嘗試取得領導或者提出任何其他作為取代的治理觀。

與「一超多強」一起，中文文獻中也常出現「新安全觀」或「非傳統安全觀」等相關詞彙。根據國際關係學者們的見解，這些概念共同指涉的範疇應該包括經濟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生態安全、運輸安全、公共衛生和防制犯罪。這個範疇是因應決策者必須全面治理內部安全議題的需要，且是與全球治理的問題相呼應。討論的焦點無不集中於這些問題如何從中國之內與從外輸入兩方面威脅到國家安全，但卻絕少在知識上將問題當成是跨國現象在解決。這樣的不對稱恰恰顯示，文獻中所理解的全球治理，基本上就是透過每個國家各自在其國內處理全球問題，雖然中國並不排斥接受外界提供的情報交流或技術援助。這個不對稱也反映了在「一超多強」這種現實主義概念中所影射的不信任感，亦即不信任華府及其盟友，懷疑他們會以治理跨國安全議題為藉口，對所謂的失敗國家進行干預。根據文獻的分析，這樣的干預其目的其實是為了傳播自由主義，而不真是為了國際安全。

中文文獻也注意到公民團體以及非政府組織的興起，並肩與主權國家政府共同治理，但也發現他們多數是在自由主義理念驅策下運作。文獻中毫不意外可以看到警告，認為表面霸權好像正在衰退，但全球治理以一種更細膩而有效的方式在鞏固霸權。多數文獻都重申各國政府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領導。與多數相對的則是值得注

註① 2009年7月9日，胡錦濤的個人代表戴秉國在 G-8 峰會以具體條列說明這些全球治理的原則，張朔，「G8 與發展中大國對話 中方闡述全球治理理念」，中國新聞網，<http://news.qq.com/a/20090709/001655.htm>, accessed on June 1, 2010.

註② 陳琴嘯在「達沃斯論壇的全球治理強音」一文中，引述副總理李克強以多極化論全球化瞭望新聞週刊，2010年2月1日，見 <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plgd/news/2010/02-01/2102458.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5 月 31 日。

註③ 黃仁偉，「金磚四國與全球治理體系」，發表於 The New Challenge, the New Role and the New Model: The Newly Rising Economi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研討會（海南，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見 <http://business.sohu.com/20091104/n267950764.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1 日）。

意的少數意見，這些意見可以回溯到 1990 年代末對「大國外交」的提倡，主張促進大陸自身內部自由化。在關於「大國外交」的早期辯論中，支持的一方主要由自由派學者組成，敦促中國政府拋掉圍城心態與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④根據他們的觀點，被迫害的歷史記憶才是使中國無法成為受尊敬大國的原因。同樣的，他們也認為中國也不能對全球治理的做出任何真正的貢獻，除非中國社會願意對各種非政府組織開放。^⑤簡言之，少數意見相信，成功的全球治理應該邀請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和中國市民群體的參與。^⑥

再加上，越來越多人注意到「天下」^⑦觀念，在哲學意義上與「和諧世界」相通。「天下」理念的特別之處在於，提供了某種看似放諸全球的價值，但卻沒有提供任何治理可資依循的價值！但天下可能造成爭論，因為天下豈容以自由主義之名改造干預所謂非自由國家？^⑧不過，反對輸出自由主義與反對自由主義本身完全不同，天下夾帶著看似防禦和被動的感覺，因為實踐「天下」是在態度上接受各國的自足自治，而不問是否為自由主義。對於北京不願意負擔全球責任，以及反對透過干預遂行全球治理的心理基礎，「天下」剛好賦予其正當性，且形同是全球治理潮流中與干預分庭抗禮的不干預主義。天下觀鼓勵每個國家從全球視角理解全球問題，但須從自身國家條件出發解決那些問題。這時的干預是當事國同意的，因此可成其為「和諧干預」（作者按：harmonious intervention）。當然，和諧干預必須向政治協商一樣先通過往返折衝與說服。

肆、自理的全球治理議程

一、公共衛生：開明專制

在過去十年，最令北京困窘的全球性問題發生在公共衛生領域。比如 2003 年肆虐的非典型性肺炎便起源於中國，蔓延到亞洲甚至世界，嚴重動搖北京以完善自我治理

註④ Chih-yu Shih, "Breeding a Reluctant Dragon: Can China rise into partnership and away from antag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1, No.4 (Oct. 2005), pp. 755-774.

註⑤ 從日雲，「全球治理、聯合國改革與中國政治發展」，*浙江學刊*（杭州），第 5 期（2005 年 9 月），頁 108-115。

註⑥ Boshu Zha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quanqiu zhili yu minzhu*), <http://www.mianfeilunwen.com/Shehui/Zonghe/27282.html>, accessed on May 31, 2010.

註⑦ Zhao Tingyang, "A Political World Philosophy in Terms of All-under-heaven (*Tian-xia*)," *Diogenes*, No. 221 (2009), pp. 5-18; 張智新，「中國外交戰略富蘊傳統智慧」，*中國評論新聞*（北京），2010 年 4 月 3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7/5/5/101275587.html?coluid=93&kindid=4910&docid=101275587>（參閱時間 2010 年 4 月 15 日）。

註⑧ 論者將和諧與治理視為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見吳興唐，「全球治理的置疑性解讀」，*當代世界*（北京），第 12 期（2007 年 12 月），頁 41-43。

做為負責任大國的內涵。④造成問題惡化的正是管理拙劣，以至於當時即使非典型性肺炎蔓延到整個中國，包括香港在內的鄰接地區出現大量死亡人數，且開始進行隔離檢疫，北京仍然拒絕通知境內公民或國際社會。對於熱衷於全球治理的國家或組織，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可能正是北京參與全球治理最好也是最壞的例證。「最好」的意思是，因為這件事情顯示北京終究能夠在主權原則下有效地改善調整，以適應全球治理的需要；「最壞」的意思是，這個事件清楚顯示北京的全球治理思維繼續是管好自己，絕沒有任何要管好全球的想法。⑤非典型肺炎事件對北京的教訓僅僅在於，要在中國管轄權內管好涉及公共衛生的方方面面。自己能管好自己，比全球性的非典型肺炎事件本身更重要。

非典型性肺炎的爆發，從兩方面挑戰中國主權。首先，非典型性肺炎的蔓延不可能限制在主權範圍之內。當局試圖隱藏流行病的訊息以保護中國形象，但最終使得中國大陸境內與國際社會無法即早獲得告知，造成悲劇。⑥國際衛生專家的技術支援影射中國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在確保自己找出解決辦法之前，往往北京拒絕提供外界訊息，甚至不承認問題存在。相同的治理風格，在對氣候問題的談判上也是如此，故北京強烈拒絕由外部監測碳排放的提議。在碳排放與非典型性肺炎案例中相同的是，主權成為抵擋外部質疑的盾牌。但北京在事後開始調整，除了處罰高階官員平息眾怒，並且改革了衛生資訊交流的政策，使得中國的公共衛生訊息較為開放（相對其他內政議題）。此外，北京不再直接拒絕國際社會在公共衛生議題上的技術支援。不過，這並非適用於全部議題：諸如愛滋病之類的議題，在 2010 年的今天，依然繼續屬於國家機密事項。⑦與愛滋病相關的非政府團體或許在某些中國城市受到歡迎，但在其他大部分的地方往往不獲政府信任，這些民間社團無法預知他們何時會或不會受到歡迎。至於由國外提供的技術和財務支援，仍必須由政府完全壟斷控制。往好的方向解讀，起碼政府的壟斷日漸開明，願意從某些全球性非政府組織獲得支援。

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也從另一方面動搖中國主權的形象，亦即關於臺灣長期以來在國際衛生議題上被北京所封鎖。⑧直到 2009 年之前，北京一直拒絕臺北在世界衛生大會（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出席，以防止臺灣藉機主張自己是獨立國家。不過

註④ 另一個涉及形象的公衛事件，是 2008 年 1 月爆發毒水餃外銷日本的事件，直到 2010 年 3 月才起訴嫌犯。

註⑤ Tan, *op. cit.*; L. H. Chan, L. Chen, and J. Xu, "China's Engagement with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Was SARS a Watershed?" *PLoS Med*, Vol. 7, No. 4 (April 2010), pp. 1-6, at <http://www.plosmedici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med.1000266>, accessed on May 28, 2012.

註⑥ Sung-Won Yoon, "Sovereign Dignity, Nationalism and the Health of a Nation: A Study of Response in Combat of Epidemics,"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8, No. 1 (April 2008), pp. 80-100.

註⑦ Se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09 Human Rights Report: China," (March 11, 2010, at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9/eap/135989.htm>, accessed on June 1, 2010.

註⑧ Jacques deLisle and Stephen A. Cozen, "Taiwa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 Victory, With Limits," *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Commentary* 29 (May 2009), at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9/05_taiwan_delisle.aspx, accessed on June 1, 2010.

在非典型性肺炎爆發期間，臺灣是災情最為嚴重的疫區之一。然而，北京衛生官員堅決拒絕臺灣進入世界衛生組織（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並阻撓臺灣透過世衛組織獲取非典型性肺炎的資訊，這畢竟是堅持中國主權完整的立場所導致的結果，臺灣既為中國的一部分，便不能成為世衛組織成員。結果，此一事件成為國際人道醜聞，^④反而諷刺性地體現中國主權不但無法提供臺灣人民在對抗非典型性肺炎的保護，甚至還是障礙，則不啻淪為一個不能對自己（臺灣）負責的大國。北京後來希望憑藉非官方的私人管道，提供臺灣相關訊息和技術。^⑤即使到 2008 年以後當臺北與北京雙邊關係大幅改進後，北京仍繼續牢牢控制臺北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活動範圍。

二、環境議題：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

在 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上，北京做出了一連串引起外界爭議的抵制，提醒觀察家想起了一個已經有 60 年歷史的外交口號——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那是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所提出，意思是說在邀請外國客人之前，主人（中國）必須先掃乾淨自己的房子。^⑥具體說，就是在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之前，共產黨必須先清理國民黨勢力，以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這個態度也逐漸形成中國外交行為的一種特殊習慣，尤其是影響到之後涉及中國內政問題的談判，包括之前提到的愛滋病和非典型性肺炎。故每遇有外國訪客或觀察家所關心的議題，只有當北京已經解決了中國內部有關的問題後，他們才會受到歡迎。實際上，即使是在中國各地方之間也是如此，從其他省份來的客人，在安排下也只會看到該地方成功治理的例子。比如退耕還林這種以環境保育為導向政策，在對形象或面子的普遍敏感心態下，省道周邊總是優先植樹，以便外賓視線所及的範圍都能看到成效。

在 2009 氣候高峰會，北京拒絕由國際觀察專家透過國際監控系統檢查各國內執行環保成效的提案。^⑦導致哥本哈根僵局的原因，除了是因為北京堅持全體成員國必須公平分擔責任，以及多邊平等參與等原則性問題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北京拒絕任何對境內碳排放的檢查。事實上，北京面對地方官員各種逃避排放管制的對策，也常常是鞭長莫及，這與執行智慧財產權保護一樣困難。也就是說，在北京確保碳排放達到一定

註④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hief in China Says ‘No Room’ for Taiwan to Join,” *Asia Africa Intelligence Wire* (April 19, 2004), at http://www.accessmylibrary.com/coms2/summary_0286-21054687_ITM, accessed on May 31, 2010.

註⑤ “This is done through ‘non-governmental channels’ which includ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experts,’” See “Th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n SAR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r. 16, 2003)” a statement b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Switzerland at <http://www.china-un.ch/eng/zmjg/jxgwtw/xgwtw/t85603.htm>, accessed June 2, 2010.

註⑥ 首先是毛澤東與米高揚（A. H. Mikoyan）會談時提出，由周恩來引述，見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二版），頁 15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1 月），頁 87。

註⑦ 「中國怎樣為全球氣候問題盡責：承擔責任，爭話語權」，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 年 12 月 3 日，見 <http://info.yidaba.com/200912/031626581002100100020885880.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2 日。

程度的減量前，即使是善意的國際觀察，仍可能動搖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故而必須先保護中國的大國形象。北京然後進一步指控工業化國家逃避自己造成碳污染的歷史責任，形同揭發他們沒有打掃自己房子就在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其中隱藏的是發達國家想要利用碳排放這樣的全球治理新興論述，扭轉過去 30 年來開發中國家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而後者所針對正是發達國家不公平的競爭地位。^⑤這種在北京眼裡逃避責任的表現，讓北京對於哥本哈根會上若干國家另闢會場形成小圈圈的作法，極度憤慨。主辦國說有邀請但是宣稱自己沒有受邀參加小圈圈的北京，以低階官員出席作為抵制。北京強硬立場所意在表達的是，中國的房子中國自己會掃乾淨，沒有人會受邀到中國的房子裡，但哥本哈根的小圈圈，不要想躲在自己的房子裡逃避打掃的責任。

在哥本哈根會議時，北京判斷工業化國家的意圖，是藉由宣示他們之間一套自己削減碳排放的標準，看似積極主動，來達到中止討論的目的，以便迴避歷史責任與之前承諾過的國際義務。北京相信這些國家是想繞過《京都議定書》，設法以聯合國氣候變化的框架會議為新起點，^⑥等於是發達國家片面提出他們自己的減放之後，剩下應達到的碳減量就轉嫁成開發中國家的責任。但是北京堅持任何國家必須理解自己對世界氣候做了什麼破壞，才能知道自己今天的責任，而不是藉由單方宣布自己有個目標。來自中國內部的一項估計指出，對工業化國家而言，應在 1990 年排放量基礎上達成 200% 的減放。^⑦北京也計算自己的責任，先根據大多數國家接受的人均所得為標準計算，然後再自我要求地用京都議定書期望於發達國家的標準重新計算，得出自己的高標準的責任，即到 2020 年時達到以 1990 年為準的 40% 的削減。北京如此接受一個發達國家應有的責任，那些把北京當作是破壞哥本哈根小圈圈的工業化國家，是否應該會感激涕零效法中國？^⑧

三、金融／貿易：嵌入性市場

改革開放促使中國在思想上與體制上向以自由主義為前提的國際經濟典範轉型。以社會主義起家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挑戰是，必須重組境內政治經濟條件來銜接全球市場。中國加入 WTO 可視為改革成功的見證，已經導致半數以上中央層次法律檔的修正或廢除，以及十數萬筆新的地方立法。^⑨這樣成功的改革，造成十年後中國成為由

註 ⑤ 張志洲，「氣候問題實質是話語權政治」，多維新聞（北京），2010 年 4 月 2 日，見 <http://politics.dwnnews.com/news/2010-04-02/55805844.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2 日）。

註 ⑥ 王偉男，「氣候話語權之爭」，解放日報（北京），2009 年 12 月 29 日，見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1229/11397169338.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1 日）。

註 ⑦ “Blame Denmark, not China, for Copenhagen Failure,” *China Daily* (2010. 1.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copenhagenclimate/2010-01/01/content_9254892.htm

註 ⑧ 「中國對減排說 YES」，世界日報（北京），2009 年 10 月 25 日，中國新聞評論將標題改為「對減排說 YES 中國成為美國榜樣」，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1/5/0/101115042.html?coluid=50&kindid=1078&docid=101115042>, accessed on June 2, 2010.（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2 日）

註 ⑨ 俞可平，「關於北京共識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對話」，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北京），第 5 期（2004 年 10 月），頁 8。

前工業化集團 G7 (Group-7) 擴大，並包括歐盟和崛起經濟體金磚四國在內，所組成的 G-20 成員，共同探索管理全球經濟的新模式。但北京對加入 WTO 和 G-20 的態度相當有區別，在加入 WTO 之際，北京有意識以全球貿易規章代替中國內部規章，是自我要求在儘量配合國際規範。相對的，在關於 G-20 議程中，北京則是準備分享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經濟改革的經驗，尤其是與那些對國際要求自由化頗有保留的國家，後者並不讚許國際經濟組織要求政府少在經濟中扮演腳色。北京對政府堅決而廣泛的領導改革，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動的俄羅斯、印尼或者拉丁美洲的自由化形成鮮明對比。^⑤於是出現了所謂的北京共識 (Beijing Consensus) 與華盛頓共識分庭抗禮。^⑥

對世界銀行或者 IMF 來說，市場競爭力是最後成功的關鍵，而中國在全球化下所享有的競爭優勢，確認了這種觀點。不過，包括世界銀行在內，認為推動自由化必須與民主化並進的看法，^⑦在中國完全找不到證據。在中國內部也有對「北京共識」的提法表達支持的人，他們提醒外界注意，政府乃是中國在進入全球市場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領導。根據北京共識的倡導者們，政府主導的內外大戰略，是動員參加經濟全球化所必須的信心來源。^⑧在國際上，這個大戰略構成的背景包括和平與發展的指導原則，建立與中亞國家共組的上海合作組織，積極參加國際反恐的協調，促成六方會談處理朝鮮半島非核問題，諸如此類。內部調整方面，主要是透過國際交流、各級黨校、政府訓練中心和高等教育機構，對幹部進行全球知識的養成。什麼需要學和誰適合接受培訓，都是黨在領導。在這種思維中，追求的是良好有效的治理，但絕難謂之為自由化。^⑨

與北京共識的提法並存的，是要求國際規範改革與推動區域市場的兩個重要主張。過去，在全球化論述流行之前，北京採用的是以南北對立為內涵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主張。當前北京仍一貫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得到差別待遇，正是這種思維的遺緒。儘管北京至今依然避免正面對國際典範中的自由主義前提表態，但中國在 2010 年獲得世界銀行第 3 大的表決權，說明開發中國家整體的影響正在上升，反映了開發中國家

註 ⑤ Simon Maxwell,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Dead: Long Live the Meta-narrative!" *Working Paper* 243,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January 2005).

註 ⑥ 黃平與崔之元 (合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註 ⑦ Claire Mercer, "NTO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 No. 1 (Jan. 2002), pp. 5-22; Philip Keefer, "What Does Political Economy Tell Us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Vice Versa?"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7 (Jun. 2004), pp. 247-272; David Williams and Tom Young, "The World Bank and Liberal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1 (March 1994), pp. 84-10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0).

註 ⑧ Yu and Zhuang, pp. 6-7.

註 ⑨ 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1, No. 89 (January/February 2010),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947/the-end-of-the-beijing-consensus>, accessed on June 2, 2010.

日益增長的市場。同時，受到歐盟（EU）的成功所啓發的北京領導人，積極贊助各種不同版本的東亞區域市場，其中往往排除印度、澳洲、紐西蘭或者其他非亞洲太平洋國家。^⑧北京共識（影射自我治理）、世界銀行改革（影射群眾路線）以及東亞的市場（影射儒家關係導向的情感），在在顯示西方工業國正與一個想像中有所不同的中國，共同形成全球舞臺。

四、維和行動：雙重平衡

北京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立場，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從開始時的抵抗、疏離，經過一段時間的測試和躊躇，最後到自覺的參與。^⑨不過始終如一的是，北京堅持在軍事干預之前必須通過多邊協商以及當事國的同意。但是，當北京逐漸學習並且適應不斷開展的國際形勢，在逐步累積經驗與自信提升之後，相同的堅持表現在實踐上也有所不同。^⑩最早在 1950 年代初韓戰期間，聯合國以制裁侵略者之名派遣部隊與人民志願軍交鋒，自是，主權原則一直是北京面對維和政策唯一立場。然而到 20 世紀末，北京已能體會聯合國的維和政策不僅僅是關於當事國的主權完整而已。如果北京能保證維和行動的多邊參與性質，有時反而願意說服當事國家接受維和行動。^⑪北京以其本身的參與，作為保證聯合國部隊遵行多邊主義。這時，當事國的同意反而有助於北京能夠防止歐洲或者美國找到藉口進行片面介入。另一方面，北京也在涉及臺北邦交國的案例中阻撓維和行動，^⑫因為這些國家與臺北的邦交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北京如何可以再去維護他們的主權？

若干關鍵的經歷使得北京更積極參與維持和平行動，但即使如此，北京對於維和的基本態度仍不傾向於積極預防問題，而是被動因應。1982 年開始，北京表示願意分擔聯合國維持和平費用，此一充滿張力的決定顯示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至此拉開中國參與維和行動的帷幕。更重要的是，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遭逢西方各國的經濟制裁之際，北京送出了五位成員到中東做為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的代表（United National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然後又以不使用否決權而在法律上成全美國對伊拉

註^⑧ Bin Sheng,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Pacific Free Trade Area: A Dilemma for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7), pp. 38-49;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Brief* 07-3 (Washington D. C.: Peter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rch 2007).

註^⑨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olicy Paper* 25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November 2009); Jing-dong Yuan, "Multilateral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Chinese Views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2 (June 1998), pp. 275-295.

註^⑩ The literature notes in general the image of a responsible country to be Beijing's major concern, an earlier recognition of such image concern is Yongjin Zhang,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From Condemnation to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3, No. 3 (Autumn 1996), pp. 1-15.

註^⑪ Gill and Huang, p. 14.

註^⑫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Asia Report* 166 (Brussels, April 17, 2009), pp. 17-18.

克發動的的軍事行動。北京也不再堅持以前反對聯合國部隊使用武力的立場，只要能事先獲得當事國同意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北京聲稱，這和國際上反對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立場一致。這些政策調整後，北京與制裁天安門事件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正常化也隨之完成。^⑭不過，北京真正的積極參與，是等到在 1999 年北約軍隊轟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的意外發生後才更明確。^⑮正是因為北約繞過聯合國採取片面行動，讓北京突然意識到通過聯合國執行維和行動的價值，只有靠多邊形式的維和行動有效運作，才能制止美國或北約片面採取干預。

現今，北京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政策，近乎某種或可稱之為「雙重制衡」的戰略。一方面，維和行動有助於制衡大國片面干預。^⑯另一方面，不管當地情勢多嚴重，堅決要求當地政府的同意，則是制衡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方法，以確保維持安全理事會監督權力不被少數大國架空。^⑰甚至可能還有第三層次的制衡，比如由北京一手策畫，而且透過雙邊說服的方式在 2006-2007 年中，蘇丹的達爾富政府 (Darfur) 同意聯合國軍隊部署在這個遭到內戰撕裂的國度。^⑱而就在聯合國軍隊進駐的同時，北京乃在財政上支援非洲聯盟 (African Union) 在蘇丹並行的維和行動。因為北京自始未在安全理事會參與發動此次維和提案，因此北京如此積極介入蘇丹內部事務可說史無前例。北京著眼於即將到來的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由於人權組織指責中國是因對蘇丹石油的渴求而寧願犧牲蘇丹的人權，正在發動抵制北京奧運。無論如何，北京說服達爾富要警覺國際干預的可能性已然大增，聯合國維和行動畢竟是相對溫和且中立的選擇，何況，態度友好的北京又會保證維和行動的公正運作。在北京堅持下，聯合國授權對蘇丹採取的嚴苛規定被排除議程。

五、防止武器擴散：自制的壟斷

長久以來，在防止核武器擴散的議題上，北京發展出兩個核心原則，然而也承受兩個無法解決的困境。兩個核心原則是，呼籲全部核子武器國家放棄使用核子武器，以及簽署非核化的區域條約。^⑲兩個困境則是，第一，是北京向來主張平等的原則，而防止核武擴散則遵循壟斷的原則，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核武國家壟斷。第二個矛盾

註 ⑭ Gary D. Rawnsley,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China, Japan and Peacekeeping," in Rachel Uitley (ed.), *Major Powers and Peacekeeping: Perspectives, Priorit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London: Ashgate, 2006), p. 85.

註 ⑮ Stefan Staehle,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Regime*, the Master of Arts dissertation,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y 21, 2006), p. 44.

註 ⑯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7), p. 200.

註 ⑰ Stefan Staehle, pp. 75~79.

註 ⑱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p. 20~22.

註 ⑲ Liping Xia,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FES Briefing Paper 8* (Shanghai: Friedrich Evert Stiftung Shanghai: August 2008), pp. 6~8; Bates Gill and Evan S. Medeiros, "Foreign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China's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66~94.

是，與北京過從甚密的鄰邦，北方有平壤、南方有伊斯蘭馬巴德，也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核武擁有國。既然北京的最終原則是建立完全非核武世界，對於這兩個矛盾便尚有自圓其說之處。雖然如此，正如同北京其他的全球治理問題立場一樣，北京通常更傾向於被動而非主動，防止核武器擴散也不例外。中國在 1964 年初次進行核子試爆，所突破的正是前此一年，由莫斯科和華府之間簽署的有限禁止核試爆條約（LTBT, Limited Test Ban Treaty），北京接著立刻提出使用核子武器的兩個原則。根據這些原則，中國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不對無核武國家使用核武，並且未來目標是全部核子國家應該廢除全部核子武器，^⑩但是這種口頭原則無法說服伊斯蘭馬巴德或平壤打消發展核武的願望，甚至外傳他們發展核武的技術與原料都與北京有關。北京也推動擴大非核化區域，區域內擁有核子武器既不必要也不合法。另外，非核化區域條約能禁止美國軍隊帶著核子武器進駐。比如朝鮮半島的非核化將可以同時規範平壤與華府。

北京幾乎在所有討論防止核擴散的場合都不斷重複這些原則。2010 年 4 月在華盛頓召開核安全高峰會議（Nuclear Security Summit），商討阻止恐怖分子組織獲得核子武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繼續以重申上述原則開場，也堅定支持不擴散的原則，^⑪可是對於防止恐怖組織取得核武則沒有具體提法。雖然非核武國家表示歡迎北京的不首先使用與不對非核武國家使用的原則，其他核武國家從來不回應。^⑫相反的，雖然恐怖主義是一個北京關心的議題，北京卻不太主動表現出參與熱誠。畢竟恐怖主義不是對中國形象的嚴重挑戰，因此北京並無急迫感。北京過去對內已經有完整控制核子武器的機制，與核武器擴散相比，北京更望把注意力放在防止核戰爭之上。只有當中國形象受到波及時，例如北韓的核武器試爆，北京才比較表現出急迫感。^⑬

在 2010 年胡錦濤赴華盛頓之前，他仍然設法讓平壤發表一項宣言，承諾將推動非核化並重返六方會談。在此承諾之前，這個華府眼中的流氓國家北韓，已經故意透過在日本上空測試飛彈引起注意，並誇示兩次試爆，逮捕再釋放美國記者。如果北京可以透過建立華府與平壤之間對話平臺，便可為朝鮮半島非核化打開一扇機會之窗，且華府亦將無理由在南韓的駐軍配備核子武器；另外，北京也可與華府商談支持東南亞成為非核化區的提案。但是，平壤並不妥協，而北京向來不贊成制裁平壤的不合作立場。通常對北京而言，制裁與北京堅持的不干預政策有所衝突，何況是可能對東北亞

註^⑩ Mingquan Zhu,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4, No. 2 (Winter 1997), pp. 40~48; 謝益顯, *中國外交史, 1949-1979*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頁 301~5。

註^⑪ 陳鶴高、劉東凱, 「胡錦濤出席核安全會, 就加強和安全提出五點主張」, 新華社電 (2010 年 4 月 13 日), 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0-04/14/content_1580131.htm (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2 日)。

註^⑫ Ji You, "China and North Korea: A Fragil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Conveni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8 (2001), pp. 387~398; also see Larry A. Niksch,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L33590*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5, 2010)。

註^⑬ Daniel A. Pinksto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hina's Proliferation Practices and Its Role in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March 10, 2005)。

地區穩定產生毀滅性後果。北京仍已經嘗試過各種訊息警告平壤克制進一步挑釁。^③一旦失控，朝鮮難民可能大量湧入中國邊境，且華府將取得採取軍事行動的理由。

六、失敗國家：和諧干預

如果歐美認定的某個失敗國家在地理上距離中國遙遠，多半不關北京的事，除了原則上堅持該國政府應解決自己國內的治理問題，以及人道干預必須得到其事先同意。^④至於那些與中國接壤的失敗國家情況就不同，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在社會上或經濟上與中國人民互動頻繁，處理不當便會造成中國內政不穩定。對中國而言，邊界上出現失敗國家主要是實事求是的問題，但對自由主義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而言，更是價值上的挑戰。雖然緬甸就是一個歐美心目中典型的失敗國家（failing state），不過內比都造成北京的問題則是很實際的。首先，中緬邊境居住許多跨界的少數民族，而內比都政府長期均未能有效統治邊境。緬甸邊區長期存在內比都無法管轄的組織性游擊隊，並透過中國輸出毒品貿易和犯罪，一直到本世紀初才透過中緬聯合行動取得控制，打擊其規模。最後，不論是在北京或東協成員國的看法中，內比都軍政府都難稱之為失敗。除了軍政府外，沒有其他的緬甸政治勢力看起來能接管或有效維持秩序。^⑤其結果，歐美批評家便常指控北京與東協形同縱容軍政府更加猖狂地侵犯人權。

當華府和歐盟指責東協拒絕制裁內比都時，^⑥北京卻一貫鼓勵東協更有耐心。對東協會員國來說，制裁內比都等同於摧毀東協，因為不干預內政、平等、個人化和非正式等作風是東協賴以運作的一貫堅持。^⑦任何制裁的措施都將破壞平等精神，並且褻瀆主權獨立原則，一旦形成先例，任其發展的話，將破壞東協成員對東協組織與彼此的信任，深恐東協將會淪為干預平臺。^⑧膾炙人口的所謂東協模式（The ASEAN WAY）即謂此風格，反映東協的本質乃是提供外交平臺，使得發生衝突的諸國，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用來協調彼此的不同，而不求其立即解決。^⑨北京的不干預政策與東協模式

註③ Christopher Twomey, "Explain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Navigating between the Scylla and Charybdis of Proliferation and Instabil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7, No. 56 (Dec. 2008), pp. 414-417.

註④ Sophie Richardson, "Challenges for a 'Responsible Power'," in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8*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7), pp. 28-30.

註⑤ Chenyang Li and Liang Fook Lye,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Myanmar: A Successful Model for Dealing with the Myanmar Issu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7, No. 2 (September 2009), pp. 284-285.

註⑥ Magnus Peterson, "Myanmar in EU-ASEAN Relations," *Asia-Europe Journal*, Vol. 4, No. 4 (Dec. 2006), pp. 563-581.

註⑦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註⑧ Mark Beeson, "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2 (Aug. 2003), pp. 251-268; Ruukun Katanyun, "Beyond Non-interference in ASEAN—the Association's Role in Myanmar'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46, No. 6 (Dec. 2006), pp. 825-845.

註⑨ Jürgen Hachke, "Enhanced Interaction with Myanmar and the Project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Is ASEAN Refining or Breaking with It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Aug. 2005), pp. 188-216.

若合符節，如此東協與北京在應付內比都軍政府的路線相互援引。^⑩東協模式與歐美採取的制裁形成對比，東協採取的個人化和非正式方法，與北京採取協商的方法如此相似，反而使北京與東協尚能與內比都維持對話，相對於歐美，起碼仍有若干影響力。

從全球治理與人道干預者的觀點來看，應該譴責北京持續提供緬甸貿易與投資，拒絕對內比都施加實質的壓力，甚至促成內比都和平壤之間的接觸。不過，正好因為這些友善的行動，北京仍然能夠與內比都溝通對話。^⑪由於北京自己都是在內部積極處理解決關乎全球治理問題的發生，以滿足國際預期，便也建議內比都遵循相同的邏輯，勸服內比都能努力在處理反對黨和民眾示威的手段上，逐漸達到國際預期。北京始終站在與內比都做朋友的立場，這樣即使道理說不通，卻還能維持交往，發揮些許影響。就算朋友的建議可能被拒絕，內比都將感覺起碼欠了朋友人情，因此對下一次的建議不那麼抵抗。反之，若採取歐美的制裁模式，將喚起當地人的殖民記憶，以致懷疑外界的干預不懷好意。藉由不把緬甸當作失敗國家，以及不把軍政府當作不可理喻，北京和東協都顯示自己沒有領土或政治野心，如此才能繼續表達關心。

伍、結 論

若把眼光放遠，在東亞近代外交史的歷程中，亞洲在帝國主義時期，所有近代化的舉措，也多表現為「殖民／被殖民」問題。在日本的近代政治思想中，表現為「亞歐對立」；^⑫而在中國則是更多專注於「民族主義」問題，簡言之，就是富國強兵。這種思潮表面上可能以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憲政主義國際主義等等形式表現，但始終都有反西方壓迫與傳統中華認同（道統）的核心在其中。因此，放在東亞政治的延長線上，中共「全球『自』理」的政策的更積極意義，就是這種內向型民族主義的體現，也是對於西方以福山為代表的普遍性思潮的反彈。^⑬

不論是北京政治領導人或知識分子，都希望中國對世界表現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雖然，他們都敏銳地探測外界期待於中國的是什麼，但是他們並無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認識，而更著重於對自己如何負責。在全球化時代，外界會關心中國是否能夠解決、減輕、防制各種全球問題的發生。但是，中國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一貫強調內省，因此在論述中國自身的世界責任時，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必須在內政層次就將問題完善處理，以此態度避免全球因中國而陷入麻煩。前所引述的習近平發言中，顯示北京領導人與對中國批評的人之間存在誤解。對於習近平和其同僚而言，中國沒有意圖領導世界，也不打算對世界的未來提出任何藍圖，甚或建立解決問題的價

註⑩ Pak K. Lee, Gerald Chan, and Lai-Ha Chan, "China's 'Realpolitik' Engagement with Myanmar," *China Security*, Vol. 5, No. 1 (Winter 1995), pp. 111~112.

註⑪ Chenyang Li and Liang Fook Lye, pp. 261, 283.

註⑫ 邵軒磊，「日本亞洲學之系譜」，*問題與研究*，第49卷專刊（2010年4月），頁71-99。

註⑬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臺北：時報出版，1993年）。

值基礎。與全球治理本身相比較，北京領導人更關心全球治理的責任分攤應該公平與平等。北京最敏感的，是要保證全球治理的提倡不會侵犯中國的國家主權。這種防人之心，能夠解釋北京獨特的風格，亦即透過全球「自」理，來達成全球治理。其關心的核心目的在於：良善自理的中國不會給其他強權干涉中國的任何理由。

北京鼓吹的全球自理，從兩方面挑戰當下流行的國際關係理論。其一，中國崛起並非以支配性或干預性的權力擴張在進行，相反的，是一種保障非干預的崛起強權。至於這樣一種不願捲入設定國際具體議程與規範的思維，是否只是對實質性規範的不熟悉、自信不足或技術性的生疏，所引起的暫時躊躇，因此遲早要接受干預主義，或是在未來，北京隨著更多的參與，因其與眾不同的思想史路徑，最終會發展出國際關係的新方向？則尚待觀察。另外，在普遍印象中，認為中國在崛起後，獲得更大的軟實力，且也開始投資於軟實力，這樣的看法未必正確。中國式論述持續使用成長、生產力或效益之類的資本主義概念，固然可能反而刺激某種相抗衡的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或和諧世界的替代性論述，但是也可能因為陷入了對資本主義的模仿，讓中國最終改造成一個自由主義社會。是否中國現代思想史可能已經培養出隨時都準備好調整思路的後現代共黨領導風格，以便中國能一方面在某些議題，某個時間，與某個對象上採取干預立場，而在另一些議題、時間與對象上，卻繼續堅持非干預？同理可以問的是，隨時都在調整的中國是否可以持續在象徵美國軟實力的自由市場價值，與有中國特色的實踐模式之間，往返而不定性？

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與儒家內省自斂的兩種思想之間，取得調和的關鍵，在於掌握中國菁英階層對權力的高度敏感。因為儒家的思想傳承與社會主義群眾路線下，權力始終是隱藏在道德天平深層起作用的重要考量。如果以和諧為終極思想關懷的中國領導菁英，在中國捲入衝突時，認為應該在短期內採取犧牲與讓步，以能維持長期和諧關係，則他們必須假定中國的實力已經強大到，能讓其他國家感受到中國的讓步，故中國的讓步可以體現成是仁愛信義，而不是擔心因為他國可能誤以為中國的忍讓是示弱而得寸進尺，擴大事態。換言之，中國追求和諧世界的理想，是要在中國實力最獲外界認可的時候，才最容易取信於世人。在中國尚未達到超級強權的階段裡，其領導人擺盪在權力折衝與思想道德之間便難避免。挑戰在於，什麼程度的強權才會是足夠取信於世人的後盾，則又不是中國領導人或任何外界觀察家片面能說了算的。

*

*

*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Self Governance: Placing the Responsible Major Stat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Chih-Yu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suan-Lei Shao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Both the political leaders and intellectuals in China want to present the image of her being a responsible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responsibility are not directed at an external audience, although they closely watch what the latter expects of China. In the global age, the expectation is always about China's contribution to conflict resolutions, and alleviation and prevention of global problems, whatever it may be. Th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classic as well as modern, are so grounded in their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background that their introspective nature determines that Chinese narratives on their nation's duty in the world unanimously point to China's responsibility for handling its domestic problems well enough to avoid causing global troubles. Xi Jinping's widely circulated quote during his trip to Mexico in 2008 reveals a deep mutual misperception between Chinese narrators and China's critics. For Xi Jinping and his colleagues, China has no intention to lead the world, or to provide the world any philosophical

guidance regarding their future, or even to participate in initiating problem-solving regimes. The Chinese care more about the mode and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an any substantive value and goal of global governance. Specifically, the Chines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global governance does not infringe upon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China. This defensive mentality which has a root in Chines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prepares China's unique styl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self-governance. While this is a style meant to avoid rendering any excuse to other major powers 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intervene in China, once on track, its political thought underpinning inevitably challenges the prevailing liberalistic methodology of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 history of ideolog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political thought, rising China

參考文獻

-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整的決定（上海：新中國書局，1990年）。
- 中共中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 王偉男，「氣候話語權之爭」，*解放日報*，2009 年 12 月 29 日，見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1229/11397169338.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1 日）。
- 包雅鈞，「中國學術界有關治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甘肅理論學刊*（蘭州），第 4 期（2008 年 7 月），頁 45~49。
- 白云真，「全球治理問題的回顧與前瞻」，*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4 期（2007 年 4 月），頁 76~83。
- 吳梅興，「和諧世界：全球治理的中國詮釋」，*濟南學報*（濟南），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43~45。
- 吳興唐，「全球治理的置疑性解讀」，*當代世界*（北京），第 12 期（2007 年 12 月），頁 41~43。
- 李義虎，*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新思維*（香港：China Review Academic Publishers，2005 年）。
- 汪澍白，*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基因*（香港：商務，1990 年）。
- 沈驥如，<http://news.sohu.com/20100326/n271128716.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5 月 31 日）。
-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臺北：時報出版，1993 年）。
- 邵軒磊，「文革後日本中國研究之轉型」，*問題與研究*（臺北），第 46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55~172。
- 邵軒磊，「日本亞洲學之系譜」，*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專刊（2010 年 4 月），頁 71~99。
- 俞可平，「關於北京共識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對話」，*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北京），第 2004 卷第 5 期（2004 年 10 月），頁 6~12。
- 胡平，「比賽革命的革命：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分析」，*胡平文選*（北京），見 http://www.boxun.com/hero/huping/43_1.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10 月 7 日）
-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儒教與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2007 年）。
- 崔艷紅，「討論中國的和諧世界思想對全球治理的意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廣

- 州)，第 2006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65~69。
- 張志洲，「氣候問題實質是話語權政治」，多維新聞，2010 年 4 月 2 日，見 <http://politics.dwnnews.com/news/2010-04-02/55805844.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2 日）。
- 張勁松，「論全球治理時代我國政府的責任」，社會科學戰線（北京），第 8 期（2008 年 8 月），頁 158~164。
- 張朔，「G8 與發展中大國對話中方闡述全球治理理念」，中國新聞網，<http://news.qq.com/a/20090709/001655.htm>（參閱日期 2010 年 6 月 1 日）。
- 張智新，「中國外交戰略富蘊傳統智慧」，中國評論新聞（北京），2010 年 4 月 3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7/5/5/101275587.html?coluid=93&kindid=4910&docid=101275587>（參閱時間 2010 年 4 月 15 日）。
- 從日雲，「全球治理、聯合國改革與中國政治發展」，浙江學刊（杭州），第 5 期（2005 年 9 月），頁 108~115。
- 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年）。
- 陳琴嘯，「達沃斯論壇的全球治理強音」，瞭望新聞週刊（北京），2010 年 2 月 1 日，見 <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plgd/news/2010/02-01/2102458.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5 月 31 日）。
- 陳鶴高、劉東凱，「胡錦濤出席核安全會，就加強和安全提出五點主張」，新華社電（2010 年 4 月 13 日）。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0-04/14/content_1580131.htm（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2 日）。
- 黃仁偉，「金磚四國與全球治理體系」，發表於 The New Challenge, the New Role and the New Model: The Newly Rising Economi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研討會（海南，2009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見 <http://business.sohu.com/20091104/n267950764.shtml>（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1 日）。
- 黃平與崔之元（合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 楊卓，「全球治理初探」，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呼和浩特），第 36 卷第 5 期，頁 39~42。
- 楊柳，「論和諧世界思想和全球治理」，中國水運（北京），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155~7。
- 葉青，「參與全球治理恰逢其時」，2010 年 4 月 13 日，http://www.dzwww.com/rollnews/news/201004/t20100413_5984558.htm（參閱時間 2010 年 5 月 31 日）。
- 編者，周恩來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 編輯部，「中國對減排說 YES」，世界日報，2009 年 10 月 25 日，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1/5/0/101115042.html?coluid=50&kindid=1078&docid=101115042>（參閱時間 2010 年 6 月 2 日）
- 編輯部，「習近平譴責他國對華事務指手劃腳」，文匯報（北京），2009 年 2 月 13 日，版 4。

- 編輯部，「中國怎樣為全球氣候問題盡責：承擔責任爭話語權」，*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年12月3日，見 <http://info.yidaba.com/200912/031626581002100100020885880.shtml> (參閱時間2010年6月2日)。
- 蔡拓，「全球治理的要義及其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 (南京)，第4期 (2005年4月)，頁29~35。
- 謝益顯，*中國外交史，1949-1979*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謝雪華，「關於全球治理的幾個問題」，*湖湘論壇* (長沙)，第22卷第2期 (2009年3月)，頁120~122、128。
- 龐中英，「中國到底怎麼參加全球治理」，*國際先驅導報* (北京)，2009年7月13日，參考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2523> (參閱時間2010年6月1日)。
- 黨建軍，「中美氣候問題爭辯與話語權爭奪」，http://www.qstheory.cn/tbzt/gbhg/zxbd/200912/t20091214_17018.htm (參閱時間2010年6月2日)。
- Acharya, Amitav, *Constructing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 Beeson, Mark, "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2 (Aug. 2003), pp. 251~268.
- Bell, Danie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Bergsten, C. Fred,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Brief*, Vol. 7, No. 3 (Washington, D. C.: Peter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rch 2007).
- Brautigam, Deborah,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9).
-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09 Human Rights Report: China," March 11, 2010, at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9/eap/135989.htm>, accessed on June 1, 2010.
- Callahan, William A., *China: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Chan, L. H., L. Chen, and J. Xu, "China's Engagement with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Was SARS a Watershed?" *PLoS Med*, Vol. 7, No. 4 (April 2010), pp. 1~6, at <http://www.plosmedici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med.1000266>, accessed on May 28, 2012.
- Chan, Lai-Ha, Pak K. Lee, and Gerald Chan,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A China Model in the Making?"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14, No. 1 (Mar. 2008), pp. 3~19.
- Chang, Kuo-sin, *Mao Tse-tung and His China*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1978).
- DeLisle, Jacques, and Stephen A. Cozen, "Taiwa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 Victory, With Limits," *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Commentary* 29 (May 2009), at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9/05_taiwan_delisle.aspx, accessed on June 1, 2010.

- Deng, Yong, "Better Than Power: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p. 60~62.
- Editor, "Blame Denmark, not China, for Copenhagen Failure," *China Daily* (01.10.20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copenhagenclimate/2010-01/01/content_9254892.htm
- Edito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hief in China Says 'No Room' for Taiwan to Join," *Asia Africa Intelligence Wire* (April 19, 2004), at http://www.accessmylibrary.com/coms2/summary_0286-21054687_ITM, accessed on May 31, 2010.
-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ill, Bates,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olicy Paper 25*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November 2009).
- Gill, Bates, and Evan S. Medeiros, "Foreign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China's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66~94.
- Gill, Bates,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7), p. 200.
- Graaf, Thijs Van De, "China as a Driving Actor in Global Governance? Feasibility and Future Challenges," *Studia Diplomatica*, Vol. LIX, No. 2 (Jun. 2006), pp. 168~169.
- Gu, Jing, John Humphrey, and Dirk Messner, "Glob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 2 (Jun. 2008), pp. 274~292.
- Gupta, Krishna Praksha, "China'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vention," *China Report*, Vol. 7, No. 12 (December 1971), pp. 12~21.
- Gupta, Krishna Praksha, "Tradition of Moder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n and Western Systems," *China Report*, Vol. 9, No. 29 (1973), pp. 29~45.
- Haccke, Jürgen, "Enhanced Interaction with Myanmar and the Project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Is ASEAN Refining or Breaking with It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Aug. 2005), pp. 188~216.
- Humphrey, John and Dirk Messner, "China and India as Emerging Global Governance Actors," in Raphael Kaplinsky (ed.), *Asian Driver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DS Bulletin*, Vol. 37, No. 1 (Jan. 2006), pp. 107~114.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Asia Report 166* (Brussels, April 17, 2009), pp. 17~18.
- Jacques, Martin,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 Junbo, Jian, "China Says 'No' to G-2," *Asia Times* (May 29, 2009),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KE29Ad01.html>, accessed on June 2, 2010.
- Katanyun, Ruukun, "Beyond Non-interference in ASEAN—the Association's Role in Myanmar'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46, No. 6 (Dec. 2006), pp. 825~845.
- Keefer, Philip, "What Does Political Economy Tell Us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Vice Versa?"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7 (Jun. 2004), pp. 247~272.
- Kurlantzick, Joshua,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ee, Pak K., Gerald Chan, and Lai-Ha Chan, "China's 'Realpolitik' Engagement with Myanmar," *China Security*, Vol. 5, No. 1 (Winter 1995), pp. 111~112.
- Li, Chenyang, and Liang Fook Lye,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Myanmar: A Successful Model for Dealing with the Myanmar Issu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7, No. 2 (September 2009), pp. 284~285.
- Lin, Yu-Sheng, "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in Benjamin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Lynch, Daniel, "Chinese Thinking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m as the *Ti*, Rationalism as the *Yo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7 (2009), pp. 87~107.
- Madsen, Richard,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Hundred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 Maxwell, Sim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Dead: Long Live the Meta-narrative!" *Working Paper 243*,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January 2005).
- Medeiros, Evan 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 22.
- Mercer, Claire, "NTO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 No. 1 (Jan. 2002), pp. 5~22.
- Metzger, Thomas,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 Mizoguchi, Yuzo, "A Search for the Perspective on the Studies of East Asia: Centering on Chinese Studie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 1 (2001), pp. 7~15.
- Ness, Peter Van, "Mao Tse-tung and 'Revolutionary Self-Relianc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0 (January/April 1971), pp. 68~74.
- Niksch, Larry A.,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L33590*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5, 2010).
- Pan, Wei, "Toward a Consultative Rule of Law Regime in China," in S. Zhao (ed.), *Deba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Rule of Law vs.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6), pp. 3~40.
- Pang, Zhongying, "Playing by the Rules? China's Growing Global Rol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October 18, 2008).
- Peterson, Magnus, "Myanmar in EU-ASEAN Relations," *Asia-Europe Journal*, Vol. 4, No. 4 (Dec. 2006), pp. 563~581.
- Pinkston, Daniel 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hina's Proliferation Practices and Its Role in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March 10, 2005).
- Pye, Lucien,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nn Arbor: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 Rawnsley, Gary D.,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China, Japan and Peacekeeping," in Rachel Utley (ed.), *Major Powers and Peacekeeping: Perspectives, Priorit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London: Ashgate, 2006).
- Richardson, Sophie, "Challenges for a 'Responsible Power'," in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8*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7), pp. 28~30.
- Salmenkari, Taru, "Searching for a Chinese Civil Society Model," *China Information*, Vol. 22, No. 3 (November 2008), pp. 397~421.
- Sheng, Bin,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Pacific Free Trade Area: A Dilemma for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7), pp. 38~49.
- Shih, Chih-yu, "Breeding a Reluctant Dragon: Can China rise into partnership and away from antag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4 (Oct. 2005), pp. 755~774.
- Shih, Chih-yu, *Collective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of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hih, Chih-yu,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90).
- Song, Zhe, Keynote Speech given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 the EU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Brussels, May 6, 2010), *Newsletter of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uropean Union* 40 (May 14, 2010).
- Staehle, Stefa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Regime*, the Master of Arts dissertation,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y 21, 2006), p. 44.
- Tan, Yeling,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A Perspective through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006, *Center on Asia and Globaliz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une 2009).

-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see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43; accessed on June 4, 2010.
- Twomey, Christopher, "Explain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Navigating between the Scylla and Charybdis of Proliferation and Instabil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7, No. 56 (Dec. 2008), pp. 414~417.
- Urio, Paolo, *Reconciling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0).
- Walder, Andrew,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Wang, Gengwu,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No. 2 (September, 2004), pp. 311~322.
- Wang, Hongying, and James N. Rosenau,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Asian Perspective*, Vol. 33, No. 3 (Fall 2009), pp. 17~22.
-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ei, Shen, "In the Mood of Multilateralism? China's Evolving Global View," Working Paper, *The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July 2008).
- Williams, David and Tom Young, "The World Bank and Liberal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1 (March 1994), pp. 84~100.
-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0).
- Wu, Kuang-ming, *On the Logic of Togetherness* (Leiden: Brill, 1998).
- Xia, Liping,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FES Briefing Paper* 8 (Shanghai: Friedrich Evert Stiftung Shanghai: August 2008), pp. 6~8.
- Yao, Yang,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1, No. 89 (January/February 2010),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947/the-end-of-the-beijing-consensus>, accessed on June 2, 2010.
- Yoon, Sung-Won, "Sovereign Dignity, Nationalism and the Health of a Nation: A Study of Response in Combat of Epidemics,"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8, No. 1 (April 2008), pp. 80~100.
- You, Ji, "China and North Korea: A Fragil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Conveni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8 (2001), pp. 387~398.
- Yu, Keping, *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Essays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Yuan, Jing-dong, "Multilateral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Chinese Views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2 (June 1998), pp. 275~295.

- Zhang, Yongji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From Condemnation to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3, No. 3 (Autumn 1996), pp. 1~15.
- Zhao, Tingyang, "A Political World Philosophy in Terms of All-under-heaven (*Tian-xia*)," *Diogenes*, No. 221 (2009). pp. 5~18.
-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 Zhu, Mingqua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4, No. 2 (Winter 1997), pp. 40~48.